



新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丛

义和团迷信及其 社会反应考察

刘 宏◎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刘宏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 - 7 - 202 - 05945 - 6

I. ①义… II. ①刘… III. ①义和团—迷信—社会影
响—研究 IV. ①K256. 707②B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7092 号

书 名 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

著 者 刘 宏

责任编辑 赵锁学 付 聪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省石家庄金剑塑料制品总厂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6 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5945 - 6/C · 223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义和团迷信现象解析	(12)
第一节 义和团迷信事象概观	(12)
第二节 义和团迷信与民俗文化的关系	(18)
第三节 义和团“神术”效能的心理学解释	(28)
第四节 义和团迷信宣传的内容与实效	(39)
第五节 义和团迷信的行为动机分析	(61)
第二章 非团民众对义和团迷信的信从与背弃	(75)
第一节 义和团运动前期的崇信与盲从	(75)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后期的背弃	(110)
第三章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120)
第一节 认可与利用的思想基础	(120)
第二节 认可与利用的实行与策略	(135)
第四章 官绅对义和团迷信的迎合与反对	(163)
第一节 肯定或附合者的情状	(163)
第二节 否定与反对者的态势	(194)
第五章 报刊舆论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	(216)
第一节 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论	(216)
第二节 对义和团迷信的否定态度	(230)

第三节 对义和团迷信的反思性言说	(245)
结语：借鉴历史经验，破除当代迷信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296)

绪 论

本书是关于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问题的专门研究。

义和团运动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这似乎是为人们熟知的情况。但事实上，对这方面系统、细致而深入地研究并不多见（详见后面关于学术史的梳理和介绍）。其障碍所在，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在传统思维定势上，似乎存在对这方面问题轻视或尽量回避的偏颇。轻视可能源于觉得它对于义和团来说不具有实质性，只是披在义和团身上的外装。回避则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不想让迷信来冲淡义和团的“革命”性，人为地使它远离“蒙昧”；二是为了绕开索解这种玄虚问题的困难，避难趋易亦属常情。要破除这种障碍，也正如这位论者所指出的，应该认识：神秘文化的东西在义和团能多大程度地作为外装来自觉利用，还是对它来说原本就具有沦肌浹髓的内在性。这本身就是需要认真考量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即离不开对义和团神秘文化情境的透彻研究，对相关材料需要特别认真地去审查、辨析和科学解读，这是深入研究相关问题跳不过去的基础，不应该因其神秘性而在研究中忽视、轻视或有意回避，简单地以“荒诞无稽”四字否定了事，而需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研究^①。对此，笔者颇有同感。

义和团运动不但本身非常复杂，而且涉及到晚清社会的各种

^① 董丛林：《义和团的“神秘文化”情境及研究说略》，载《人文杂志》，2009（3）。

矛盾，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等等，致使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和阶层，都不可避免地与此场运动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以往研究，相对集中于义和团本身的迷信问题，对社会各群体、阶层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则鲜有论及。比如非团民众，清廷守旧派人物，一般官绅，对义和团迷信的认识和态度具体如何，各呈怎样的特点，以往研究难说十分到位。还有报刊舆论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情状，也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鉴于上述情况，本书的论题将义和团迷信与社会反应结合起来作一体化研究（正因为如此，下面的论述中，为行文的简练，有时也以广义的“义和团迷信问题”，来指代这种一体化研究的范畴），当更有其学术意义，能在深化和拓展义和团运动史的整体研究方面添砖加瓦，也会有助于对于义和团运动、对义和团时代的了解和理解。不妨设想一下：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距今仅仅110来年，当时义和团迷信竟那样盛行，且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甚至闹到所谓“举国若狂”的份上。今人一般很难理解，而这又决不是简单地以“荒唐”、“愚昧”予以嘲笑、否定就可了事的，实在需要明了其具体情状，进行科学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研究不是可于此有所助益吗？与此相联系，本书的研究当也有现实资鉴意义。现实当中，尽管随着时代变迁、社会进步以及国民素质条件的逐步优化，迷信的市场越来越小，但也远远未能与之绝缘，迷信现象的存在和社会影响仍是不可忽视的事情，破除迷信，即离不开历史的借鉴，本书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当有所助益。

一百多年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虽然涉及迷信的专题性研究鲜见，但关涉性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

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庚子事变后

不久，有关书籍即陆续出版，如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罗惇融《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等等。20世纪20年代，对义和团迷信问题的研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论及义和团运动发生的内在原因，认为是“根于历史上遗传之”“排外”和“迷信”两种心理^①。这种观点十分流行。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克林德碑》一文，也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②。这派观点，将蒙昧的迷信当作导致义和团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否定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性。另一种与上述观点迥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义和团迷信问题的认识。1924—1925年，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响导》周报在纪念“九七特刊”上发表多篇文章，驳斥士大夫之流对义和团的指责和诋毁，充分肯定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正义性和革命精神，尽管也指出义和团的迷信缺点，但“并没有把这些落后性作为运动的本质去看待，也没有对它作过分的谴责，而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解释”^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有关著述，在论述义和团运动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其迷信问题，影响最大的是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认为“义和团在形式上是以落后的宗教迷信表现出来，实际上却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反帝的运动。当时人民在满清愚民政策与宗教麻醉的欺骗影响下，只能由这种落后形式表现他们的义愤，不应该对之做过高的要求”，又持论义和团勇敢精神的来源，“主要是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迷信只能起辅助作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85页，商务印书馆1947。

② 陈独秀：《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

③ 路遥：《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概述（1949—1983）》，见路遥编：《义和团运动》，第12页，巴蜀书社，1985。

用”，“说义和团运动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迷信行为，那是不合事实的毁谤”^①，仍然是秉承2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趋于统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翦伯赞《义和团运动》一文。其中指出，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着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特别它崇拜很多的神灵，还有各种符术和咒语……更是充满了宗教色彩的表现”^②。但翦文并没有过分指责这些迷信现象，而是透过现象，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现实的革命狂热”，认为“他们之所以唤起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作为神来崇拜，是希望把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的身上，使自己更有力量来击败他们的穷凶极恶的敌人，使他们在战斗中造成奇迹”^③。翦文观点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主旨是称扬义和团迷信表象背后的革命精神。至于“文革”当中，对义和团“革命性”的张扬，已经完全脱离学术轨道。

“文革”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义和团迷信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就著作而言，陈振江、程歆合著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一书，专设《从文献看义和团的信仰和风习》一章^④。董丛林在《晚清社会传闻研究》中，专设“神异传闻”一节，其中涉及义和团时期的迷信传闻^⑤。王玉德著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341、373页，人民出版社，1947年2月延安初稿，1952年10月北京修订稿。

② 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原载《历史教学》，1958（5），又见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6-7页，中华书局，1984。

③ 翦伯赞：《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7页。

④ 陈振江、程歆：《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⑤ 董丛林：《晚清社会传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从义和团“神秘主义”产生的原因、所起作用以及对其如何评价等几个方面做了论述^①。

相关论文当然更多。关于义和团本身的迷信状况，是学者考察的重要方面：如李文海、刘仰东的《义和团时期的社会心理分析》，认为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最主要的还是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但“迷信思想也应该看作是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之一种”，并具体考察义和团迷信思想，指出迷信是一种“不科学的、反科学的思想武器”，其结果是给义和团运动带来巨大损害^②。程歙在《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文中，将义和团迷信的意识和行为与乡土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对乡土迷信不能取嘲笑的态度，而应当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③。罗萍的《义和团劫运观的历史内涵》，是研究义和团劫运观少有的论文之一。杨天宏的《义和团“神术”论略》，认为所谓义和团“神术”，“不过是传统的气功术、巫术与武术的结合”^④。张鸣《华北农村的巫觋风习与义和团运动》一文，认为义和团巫术行为来源于华北农村普遍的巫术风习，采用这种武器，“并不仅仅由于农民认识上的局限和义和团动员群众的需要”，实是“一种仓促和无奈的选择”^⑤。

关于其他社会阶层对义和团迷信认识和看法的，也有一些，如袁志海《义和团时期京津下层平民心态研究》，揭示了义和团高涨与失败时期京津下层平民的不同心态，如仇教排外、迷信从

① 王玉德：《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② 李文海、刘仰东：《义和团时期的社会心理分析》，载《近代史研究》，1986（5）。

③ 程歙：《民俗信仰与拳民意识》，见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

④ 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载《近代史研究》，1993（5）。

⑤ 张鸣：《华北农村的巫觋风习与义和团运动》，载《清史研究》，1998（4）。

众、恐惧避祸、贪利投机等等^①。黎仁凯的《义和团时期统治集团各派心态分析》一文，将清朝统治集团分为“抚团排外”和“剿团和洋”两大派，分析他们对义和团政策的歧异，论及两派对义和团“神术”的不同态度^②。孔祥吉在《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文中，认为慈禧敢于与列强开战，与她深信义和团“法术可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③。史革新《义和团运动与近代思想启蒙》一文认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反思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性，包括“宗教迷信”等等，认识到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④。

台湾及外国学者对义和团迷信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影响较大的是台湾学者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和美国学者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虽然这三部著作并非专门研究义和团迷信问题，但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涉及：戴著揭示降神附体等神术“真象”^⑤，为后人认识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周著认为义和团“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因其“易于接受”的特点，“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⑥；柯著对义和团迷信问题论述颇为精

① 袁志海：《义和团时期京津下层平民心态研究》，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② 黎仁凯：《义和团时期统治集团各派心态分析》，载《河北大学学报》，1993（1）。

③ 孔祥吉：《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见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651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④ 史革新：《义和团运动与近代思想启蒙》，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

⑤ 戴玄之：《义和团研究》，第21-3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

⑥ 〔美〕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第5、6、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详，是迄今为止涉及这一领域篇幅最大、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

由于篇幅所限，上述对一百多年来中外学者涉及义和团迷信问题研究情况的梳理，只是一个粗略的勾勒。可以看出，学者们就此问题各抒己见，观点各异，认识角度不一，这些对本书的运思和写作来说，奠定了可资参考借鉴的重要基础。当然，也余留了可进一步拓展和创新的较大学术空间：

其一，对义和团迷信问题进行总体性专门研究的著作尚付阙如。专论义和团迷信（称谓有所不同，或称“神秘主义”、“宗教迷信”，等等）者虽然有些，但主要限于篇幅较短的论文，且数量有限，更多的是在文章或著作中连带涉及，尚未见有研究义和团迷信问题的专著，更无将其与社会反应作一体性研究者。

其二，研究观念和方法上也有进一步发挥的余地。从前述学术史的回顾可以看出，对义和团迷信的认识，在大陆学术界忽“左”忽“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气候的制约和影响，这在20世纪前80年尤为突出。最近30年来，学界思想开放，与西方学界的联系、沟通加强，对义和团迷信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总体上有很大改进，但也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在以现代化（或称“近代化”）模式观照中国近代史的视野中，义和团运动便有意无意地被轻视或忽略（义和团研究近年相对冷寂的局面是醒目的），这其实也是一种偏弊。树立和强化科学、正确的观念，实事求是地对义和团包括其迷信问题进行新的研究，仍然有很多工作可做。另外，义和团迷信问题涉及诸多学科领域，在立足于历史学的基础上，结合运用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理论对其进行探讨，实属必要，也是创新的重要途径。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如运用社会心理学原理解释义和团“降神附体”等迷信现象，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对于义和团迷信的

社会心理，等等。

本书旨在对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问题作一体性研究，研究思路具体体现于框架设计。全书除绪论之外，内容分为六部分：第一章揭示义和团的迷信事象，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予以解析；第二章论述非团民众对义和团迷信的信从与背弃；第三章揭示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和利用；第四章阐说一般官绅对义和团迷信的迎合与反对；第五章考察报刊舆论对义和团迷信问题的认识与评价；结语部分主要是借鉴历史经验、反对当代迷信。显然，在前五章当中，第一章是“义和团迷信”内容的本体部分，也是下四章的一个立基，没有这一章内容，以后各章就没有依凭，无法展开。第二、三、四章是对不同社会群体阶层之于义和团迷信反应的揭示和探析，所涉主体，非团民众自为“民”之属，清廷守旧派是清朝统治集团的一个特殊群体，官绅也基本可以划归清朝统治阶级的阵营（“绅”的身份介于“官”“民”之间，而利益联系上更近于官）。这几者社会地位不同，政治取向有别，文化层次不一，与义和团的关系、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各呈颇为复杂的状况。尽管各自内部都有“正”与“反”两种状貌的呈现（或是同时并存，或是阶段转化），但具体情况和成因又各不相同，将这些明晰地揭示出来并予以合理解析，即本书这三章的追求。第五章亦即本书最后一章，所考察的报刊舆论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是相关社会舆论中颇具特色的一部分，尽管报刊所属的派别不同，政治倾向不一，但在对义和团迷信反应方面，却有趋同现象。当然，背后的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纷纭复杂，故专作一章来考察。总括说来，本书的后四章尽管不是义和团迷信的本体，但又都是紧紧扣住它展开，与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社会联系意义上的“义和团迷信问题”。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义和团迷信”。在解释这一概念之前，

首先要了解“迷信”的概念。关于“迷信”，权威的《中文大辞典》中的解释是：指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或崇拜，如：迷信书本、迷信古人^①。本书关于“迷信”的含义取前者。而所谓“义和团迷信”，是指义和团具有的这类迷信观念和行为，它们存在于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杀洋灭教”的斗争紧密联系，它们来源于自古相沿的民俗文化，又是对民间宗教同类信仰的承继和改造。对“义和团迷信”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者，泛指所有的义和团迷信事象，包括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主要是多神崇拜、“劫”的观念以及各种“神术”行为；狭义者，就是特指义和团“神术”行为，因义和团用于灭洋的迷信手段主要就是各种“神术”。笔者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多是泛指，有时也具体对应某一迷信事象。

需要注意到，有些学者在论及义和团迷信问题时，或不用“迷信”字眼，而是使用其他词汇，最常见的是“宗教”^②、“宗教迷信”、“神秘主义”、“神秘现象”^③，等等。尽管在具体指称的含义上或有某些差别，但大旨上与本书所用“迷信”略同。笔者认为，所谓“迷信”，既可以指世俗迷信，也可以指宗教迷信，而在“义和团迷信”中，确实包含了许多宗教迷信的成分，如上所说义和团继承了民间宗教的信仰和组织形式，另外，义和

① 《辞海》（中），第240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② 参见〔美〕柯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见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又见〔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③ 参见董丛林：《义和团运动时期神秘传闻现象探析》，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王玉德：《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陈振江、程献：《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90页。

团崇拜的神灵，很多来自于佛、道两教，如观音菩萨、济公佛僧、玉皇大帝、张天师等等；而义和团“降神附体”，是模仿民间道士此类巫术行为^①。这或是许多中外学者使用“宗教”和“宗教迷信”概念的原因之一。至于“神秘”的观念，据王玉德教授考释，它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如万物有灵、神仙崇拜、神话、鬼神妖怪、世俗迷信、宗教思想、奥秘知识、预测思想、灵感奇谈等^②。可见，其中很大一部分正是笔者所称“迷信”的内容。因此，综观中外学者对义和团此类行为的指称，所谓“迷信”、“宗教”、“宗教迷信”、“神秘”等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指义和团非理性的特征而言。本书使用“迷信”一词，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迷信”一词更适宜表达下层民众普遍的信仰状态，对义和团来说尤为适合^③。

对“神术”、“巫术”与“法术”的关系，也有必要加以说明。所谓“神术”，是本书中通常使用的对义和团相关行为方式的一种泛称，它囊括所谓“巫术”和“法术”。至于“巫术”与“法术”，是相对具体的特称，不过在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巫术”与“法术”有本质的区别，所谓“巫术”，是指幻想依靠超自然力对客体强加影响或控制；而“法术”，是指幻想以特定动作来影响或控制客观对象，它与“巫术”的不同在于，没有依靠神力行事的观念^④。另一种观点，

① 参见张鸣：《华北农村的巫觋风习与义和团运动》，载《清史研究》，1998（4）。

② 王玉德：《神秘主义与中国近代社会》，第5页。

③ “迷信”与“宗教”有密切联系，但又有很大区别，不能将两者简单地等同起来。在民间广泛存在的各种信奉超自然的非理性活动，如巫术、算命、相面、风水等等，它们一般不属于“宗教”，应划归“迷信”的范围。因此，对于下层民众义和团的所谓“信仰”，用“迷信”相称更为适宜。

④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第486、72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则将“法术”纳入“巫术”，如张紫晨先生在《中国巫术》一书中说：“巫术，在国际上用 Magic 来表示，在中国则以‘做法’或法术相称。……它是人类为了有效地控制环境（外界自然）与想象的鬼灵世界所使用的手段。”^①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认为“巫术”与“法术”存在差别。具体到义和团，他们的行为主要是“巫术”，即幻想依靠神灵的超自然力对洋人洋物施加影响或控制，这与不依靠神力行事的“法术”显然不同。从时人著述中亦可看出义和团巫术的这一特征，“其神曰洪钧老祖，骊山老母，来常以夜，燎而祠之，为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枪炮令不燃。”^② 当然，时人因为对“巫术”、“法术”难有像今人这样的科学区分，也多有以“法术”指称义和团巫术者，如天津士绅刘孟扬记述，传说红灯照“临战时，能保护义和拳，能在空中用法术纵火”^③；北京士绅仲芳氏也称，“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意团民法术无灵，火势猛烈……延烧甚凶”^④；京城某大臣也称赞义和团“皆是天生奇材，有无穷法术，可以包打西人”^⑤。为了尽量减少淆乱，笔者行文中，除了直接引文照旧外，一般尽量用“神术”的指称，而只在特殊需要时使用“法术”或“巫术”的概念。

① 张紫晨：《中国巫术》，第37页，转引自詹鄞鑫：《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第2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②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2页，上海书店，2000。

③ 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第9页，上海书店，2000。

④ 仲芳氏：《庚子记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庚子记事》，第13-14页，中华书局，1978。

⑤ 日本佐原笃介等辑：《拳乱纪闻》，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27页。

第一章 义和团迷信现象解析

第一节 义和团迷信事象概观

尽管义和团迷信事象纷繁复杂，但不外乎思想和行为两个层面。

在思想层面，最突出的是对“天”的信仰、多神崇拜和“劫”的观念。

在义和团众多宣传品中，对“天”的信仰十分突出。它们常自称是天遣的“神兵”，把反洋教起事说成是奉了“天帝”旨意，如一告白称：“天帝方遣神佛下界灭洋，首批下界战魔遣顽者乃红灯照、义和拳。”^① 一义和团揭帖以玉皇大帝的名义宣称，“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号召各界人民“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②。另一揭帖也说，“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③。义和团如此宣传，是为了表明其反洋教起事的正义性和不可抗拒，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众支持。其实，借助天威起事并非是义和团的发明，这在古代也是常有之事。例如，东

① 《告白》，见陈振江、程献：《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51页。

② 《北京西城义和团揭帖》，见陈振江、程献：《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14页。

③ 《马兰村坎字团晓谕》，见陈振江、程献：《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6页。

汉末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①的口号；宋代宋江起义也以“替天行道”为号召。义和团借助天威自我神化，既是一种斗争手段和策略，同时也说明在他们的精神信仰中，对“天”的信仰是一个重要方面。

多神崇拜乃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显著特征，它由远古原始信仰传袭而来，崇拜对象涉及万事万物，如天地、日月等自然体，风、雨、雷、电等自然物和自然力，还有各种动植物以及人死后的所谓“灵”等等。降至晚清，民间信仰仍是多神化。义和团崇拜多神，主要是由于他们互不统属，来自不同地域，信仰的神灵各不相同，从而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在义和团崇拜的神灵中，儒、释、道兼而有之，还有数量更多的民间信仰的神灵，特别是小说、戏曲、神话、传说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后者成为义和团神灵崇拜的一大特征。一般民众崇拜的神灵主要是自然神、祖先神、人物神和动物神等等^②，义和团信仰的神灵则绝大多数为人物神，如关公、赵云、张飞、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哪吒、孙膑、岳飞、杨家将等等。这些人物大都具有“除暴安良”、“勇于杀伐”的品格特点，因而受到义和团的青睐，大约是期望以这些能征惯战的英雄人物作护符，使自己在充满危险的反洋教、反侵略作战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劫”，原本是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的用语，表示一种悠久的历史观念，其中也包含了灾难与厄运的内容^③。传入中国

①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② 参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③ 马西沙著：《清代八卦教》，第1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